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再认识

——基于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思考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①它是历史理论的核心，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理论。19世纪中叶，黑格尔的历史观达到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顶峰。马克思通过对其批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强调，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了人类历史自远古以来虽错综复杂，却始终改变不了世界历史进程是受内在一般规律支配的这一历史奥秘。近一百八十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时俱化，在社会实践中汲取生机，蓬勃发展。在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等论述，^②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20世纪初，中国先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等的大事。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对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方向等事关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亟待科学的认识和阐释。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②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史学应时而生，自其诞生之时起，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坚持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思潮，同时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借鉴苏联等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在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了中国史学的伟大变革，揭开了中国史学的崭新一页。我们要认清“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首先应从这里溯源。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追溯到建党初期，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和范畴并为全党接受，则是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克服错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与中国革命风雨同行，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时期，李大钊就指出，历史“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②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西方史学思想史时，重点探讨了圣西门、孔德、孔多塞、波丹、鲁雷、孟德斯鸠、维科、李凯尔特等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思想，其目的是通过分析唯物史观的“前史”，论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真理性，使之成为中国人民“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的思想武器。^③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是不断发展的持续过程，今天仍在进行。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中国革命的内容不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往往表现不同的时代主题，但从未脱离唯物史观的理论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③ 《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3卷，第222页。

指导，从不脱离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始终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土地革命时期，郭沫若继李大钊之后，积极宣传并践行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高扬唯物史观的理论旗帜，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重大贡献。此外，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史研究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翦伯赞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邓中夏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研究、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等，无不体现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凸显中国意识，为践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做出的积极努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号召全党都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因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历史知识”和“革命理论”“革命运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重大的时代责任和使命。这一时期，吕振羽、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研究，范文澜、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郭沫若、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吕振羽的民族史研究，翦伯赞的历史哲学研究，张闻天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研究，以及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研究等都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同频共振，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1949年9月29日，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国际事务。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开启了中国历史学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内容、新使命，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上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人物评价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深入讨论。“五朵金花”等理论成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时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亿万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斗争，不仅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的建构，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二

中国是一个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如同恢宏的中国历史不能割裂一样，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也同样不可割裂。中国史学发展史，大体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以下相互联系的五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先秦两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是中国史学萌发、形成和发展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优良治史传统。首先是倡导“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进步历史观。其次，以经世致用为史学宗旨，彰显其社会功能，如“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最后，秉笔直书实录，求真求实，崇尚“信史”，追求“良史”。1902年，梁启超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完成《新史学》等著述。他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因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史界革命”，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①将史学的发展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密切结合在一起。

第二个阶段，自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产生了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时而生，自觉地将历史研究

^①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1页。

服务于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

第三个阶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仅仅是中国史学中的一个学派，而在全国确立了主导地位。在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各领域，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

第四个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史学迎来了春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努力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向国家和人民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科学成果”，是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结合中华民族的特点，走自己的道路。”^①深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加快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上日程，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第五个阶段，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中国史学守正创新，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不动摇，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赓续了中国史学的文脉。唯物史观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因，古老的中国史学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发展中。

上述五个阶段各有鲜明的时代内容，每一个新阶段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前一阶段的继承、创新和升华。这一回溯不仅可以使我们牢记“自己是谁”，而且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有不忘记来时的路，才能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之“新”，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历经近百年发展在现代的具体体现，其理论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扎根中国大地，从不脱离中国基本国情。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

^① 本刊评论员：《努力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时期、伟大的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 21 世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史学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为深入认识、解决中国问题贡献历史的智慧。

其次，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不仅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根脉传承的史学史意义，更将唯物史观中的阶级观、实践观、发展观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等结合起来，并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源源不断地融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使先秦以降数千年发展着的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旗帜下获得永恒青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表达，超越时空，是古老的中国史学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形态。

最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既要立足中国，又要放眼世界，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以海纳百川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博采众长、不断拓宽全球视野的同时，坚定文化自信，不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范畴，作出中国话语的阐释；通过不断巩固、发展中国史学主体性，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在世界史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三

历史理论研究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脱离历史理论研究的历史研究是不完整的历史研究。何谓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界在述及历史理论时，往往将其与史学理论并提。例如，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没有单独的“历史理论”条目，而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条。编写者强调这是“历史学领域的两种理论体系”，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研究领域”。编写者对二者做如下区分：历史理论“是人们在研究客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阶段性、统一性、多样性，历史发

展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而史学理论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和阶段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①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曾就何谓“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展开过热烈的讨论,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条目,应该是当时在讨论中形成的共识性成果。

时光荏苒,在此期间,中华民族通过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的生成,使中国史学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深刻变革,主要标识是守正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加快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极大地凸显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包括对历史理论等做出中国话语的新解读。这也是对“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真正想明白了、想对了”之后,对“到哪里去”的回答。

近三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历史学各学科加快融合贯通,打破知识壁垒;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理论研究(历史理论)和历史学自身发展进程中的理论研究(史学理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深度融合明显加强。这突出表现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历史认识主体同时也是社会主体,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学术上精益求精,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思想性、科学性、规范性、创新性的同时,也表现出空前的社会担当;历史研究关注重大时代课题,坚持回答时代之问,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属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重要力量。人们对于现实认识的深度决定着对历史认识的深度,当人们的历史认识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和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深刻理解的思考上,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无疑会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基于上述事实,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继续称之为是“历史学领域的两种理论体系”显然已不合时宜。任何一个学术观念(包括历史学)生成后并不是千古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其结构和层次、新的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1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选择和更新等，都有规律性的演变可循。就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而言，整合、贯通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弥合长期以来人为造成的割裂，不仅是史学自身发展、学科创新的需求，更是正在发生着的深刻的时代变革的要求。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理论”理解，明确其既包括“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理论”，也包括“历史学自身发展进程中的理论”；当打通两者的学科壁垒之后，这两方面的内容已不再分属于“两种理论体系”，而是在中国话语的“历史理论”范畴内的辩证统一。

在实践中，“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已经相互渗透、深度融合成“一个”，即在探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时，要自觉地汲取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新的理论成果；在探讨历史学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时，要坚实地依托史学实证研究新的优秀成果。这样，历史理论研究“理论描述”的特点，会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展开。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统领下，历史理论这一概念更凸显其整体上的内在联系和不可分割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实现历史理论研究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具有完整意义的历史理论研究，不仅是史学主体性和史家主体意识的生动展现，也是人类历史进步趋势的规律性标识。强调“历史理论”是“一个”而不是“两种”理论体系的根本目的，是主动地适应历史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选题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视野不断开阔，这些新时代历史研究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新变化。

2023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①这一重要论述阐释了“大历史观”的基本内涵和重大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毋庸置疑，这里说的“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而不是澳大利亚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等西方史家热议的“大历史观”（big history），也不是美籍华人黄仁宇笔下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而是作为唯物史观新的增长点的“大历史观”。我们的“大历史观”不是历史认识时空的延长或扩大，而是植根于唯物史观的一种

^①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新的历史观念的凸显，即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亦即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大”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一有机整体，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规律性的运动。^①我们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探究历史规律”。^②历史认识主体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在大历史观中的辩证统一，对彻底摒弃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客观主义”等错误观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的核心理论，对历史理论研究尤为重要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是一门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具有最高视野的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也就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史学……它根据大量史实并以理论形式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③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一些西方史学家也持相同意见。如大卫·克里斯蒂安说：“世人似乎重新发现了整体历史宏大叙事的重要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属于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马克思也可归入‘大历史学家’的范畴，因为他认定人类史乃科学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④

“大历史观”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在实践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为深化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开辟着宽广的现实发展道路。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历史理论研究必将奉献出越来越多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传世之作。

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号召，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发展；建构、巩固和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是新时代史学工作者庄严的历史责任。在新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中，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坚守理论创新的根和魂，主动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用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理论研究成

① 于沛：《历史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② 于沛：《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吴江：《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④ 薄洁萍等：《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

果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为人民做学问，做人民需要的学问，为繁荣发展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

历史·历史知识·中国自主历史理论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历史理论的核心关键词释意

张政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教授）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辉煌文明步入伟大复兴的今天，当下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需要中国化的历史理性指引与关怀。中国化的历史理性立足于中国化的历史、历史知识、自主历史理论知识体系的理解与把握，以中国自主历史理论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自主历史理论知识体系需要解释中国历史理论中“历史”“历史知识”“中国自主历史理论知识体系”等核心关键词，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理论做出理性的中国化立场选择和本土化知识建构。

一、历史与历史知识

自古以来，中西方对历史就有不同的理解立场和知识态度。

西方历史意识萌发之初，古希腊诗人荷马就将《荷马史诗》中探访和询问目击者、叙述目击者证词、解释目击者陈述称为历史。公元前430年，古希腊希罗多德写就一部名为 *Ἱστορίαι* 的9卷本巨著。*Ἱστορίαι* 的古希腊语义为探索或探究，后代西方史学家将希罗多德所著的 *Ἱστορίαι* 译为《历史》，希罗多德也被西方学者称为“历史之父”。公元109年，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写就古罗马帝国从公元69年至公元96年的编年史著作，取名为 *Historiae*。可以说，西方语境中的历史一词之本源不在于事而在于识。在西方史学语境和文